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12年 第 4 期

总刊第22期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编

要 目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

专刊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

www.ccg.org.cn

电话: 010 - 65611038 , 65611039 , 65611041 传真: 010-65611040

邮箱: bianjibu@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主办单位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总编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段培君 中共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裴敏欣 美国克莱蒙大学政治学教授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汤敏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教授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张旭东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特邀专家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鲍曙明 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郭生祥 澳大利亚澳华金融专家协会理事长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胡元豹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兼执行长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磊 日本法政大学工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罗亚东 美国迈阿密大学战略与国际商务讲座教授

梅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

彭维刚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数学教授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学院教授

隋殿志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助理校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唐永春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中心主任

王坚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传播学院教授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王晓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吴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玫瑰石顾问公司独立经济学家

谢宇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真格基金会创始人

许晔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颜海平 康奈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杨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壮 北京大学国际MBA国际院长

张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赵红心 美国圣路易大学财经教授

赵德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执行主编：苗 绿

责任编辑：潘 攀

编 务：赵映曦 吴雪莹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成功举办“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

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发展和改革，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为高等教育创造新条件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承担着最重要的责任。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提高质量应该成为下一步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很多挑战，如何把投入转化为效益和质量需要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制度，在高等教育治理、知识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高和改善空间。

2012年4月21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联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于北京索菲特大酒店成功主办：“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何进，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祁冬涛，上海建桥学院副董事长黄清云，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副所长邓希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毛亚庆等近八十余位高校教授、企业高管、媒体记者到会参加本次研讨。

研讨会分为四个主题：（1）中国的教育哲学问题；（2）中国高等教育治理；（3）中国高校知识创新体制；（4）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体制，探讨高校如何回归服务于学术创新和知识传承的本位，以及高教改革的空间和路径，并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会议主办方会邀请专家对课题报告进行点评、讨论，以期有更深入的探讨。

『欢迎致辞』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辉耀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各位教授，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各位参加本次研讨会。今天到场的嘉宾来自各行各业，但是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很荣幸这次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能够作为主办方之一，同时也对大家今天参加本次“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表示热烈欢迎。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规划纲要》，而且教育也是全社会和整个国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但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不是非常理想。未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要从“人口红利”转型到“人才教育”上，要从中国的“招商引资”转移到“招才引智”上。包括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投资拉动经济要转移成人才、教育推动经济。所以今天举办这个研讨会是非常及时、非常到位的。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际上国家也重视，各个大学也都在探索，但是中国的教育在很多方面我认为还有巨大的调整和改革的空间。实际上教育到了最后，或者说如果我们再不进行深层次改革的话，可能会拖住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了很多工作与研究，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个课题组，从2011年1月开始，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这些地方深入的采访，形成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改革的路径和选择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既是一个学术研讨会，也是一个探讨的会议，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今天的研讨会内容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中国教育的哲学问题；另一个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治理；还有中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体制；最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制。这四个课题都非常切合目前大家所关注的这些要点话题。另外，我也想讲一讲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这家久负盛名的研究机构，特别是这些年在郑永年先生的领导下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我们经常看到郑先生在国内不仅在教育方面，在很多领域他都有专业的建树。并且得到了很多领导和学者专家们的关注，今天我们有幸聆听他和他的团队对这方面的成果研究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最后，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全球化研究中心，该中心也有三年的历史，目前是专注国际化、满足国际人才，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华人华侨智库方面的一些研究。目前我们跟国内国外很多机构合作，特别是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密切的合作。所以，今天很荣幸和东亚研究所一起来举办这个活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首先要感谢王辉耀先生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前几年我跟王辉耀先生也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做过交流，我本身也是从这个教育系统出去，我完全明确它的重要性。我现在身处新加坡，大家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像他们喝的水都从马来西亚进口。但他们所有的资源就是人才，所以我感觉到人才很重要。我自己也去过北美、欧洲的一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教育系统、研究系统与高教制度也有些了解，虽然没有很多理论，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些国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第三点，今天在座的都是高等教育真正的专家，我们是外行，但是我前些年跟何进先生谈过，是从非教育的角度看中国教育的问题，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所以今天我们是外行评论内行。正是因为这样，待会我们发言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什么不对请大家谅解。我自己总体看，我觉得中国不存在一个独立的高教系统，中国的高教系统只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系统的延伸，咱们如果跟其他国家相比较的话是有不同的。即使这样，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问题还是很多，另一方面也很有希望。因为华人社会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大家都已经搭建出来不同的高教系统、高等教育的体制，我想中国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借鉴。

第一部分：中国的教育哲学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为什么讲中国的教育哲学？因为我们看西方的历史以及它的整个教育史，从以前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出现是一个思想、一个理念的结果，现在我们如果光看它的体制情况，它的体制到底是跟什么有关系？实际上是启蒙运动以后有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我看到中国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就是一个思想驱动的，如果思路不对，如果没有一个主题思想，大家如果光是从体制上来看，这个体制就很难有突破口。

我在想，中国的教育哲学是什么，中国有没有教育哲学。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看很多书，关于中国的教育哲学，文章很多。看了很多材料以后我就在思考，“当下到底是谁的教育哲学”，是皇帝的教育哲学？还是教育者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我在想这个问题。提倡教育哲学的这些人他的认同是什么？他的边界是什么？这个非常值得思考。我从西方的教育哲学里看出一个概念，那就是专业主义。所有教育哲学的核心都是围绕着这个，这个教育哲学是个教育者的哲学，不是其他人的，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商人或者其他社

会群体。

那么如果比较中国，当然也不是说比较中国错对的问题，就是讲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从历史上看，我们先讲儒、道、法家，就是几个重大的流派。道家有没有教育哲学？道家有它的教育哲学，但是道家是不关心政治的，对社会政治不关心，道家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它不是教育哲学。那么我也在想，实际上道家是提倡独立，不依附于政权。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讲，中国道家最有资格发掘出自己的知识体系，但是道家在发掘知识体系方面有它的缺陷。因为道家讲主体、客体不分，我们看它讲人与自然的合一，当然，这种观念现在非常先进，从现在讲怀抱主义非常先进，甚至是后现代主义。但是不管怎么样，主、客体不分，使得道家很难产生对客体事物性的研究，所以没有产生知识体系。故而它既没有体现教育哲学，也没有产生知识体系。

佛教从印度来，它有没有它的教育哲学？也没有。这一点我还在思考，因为西方教育哲学的产生跟它的基督教、跟它的宗教理念有关系。因为宗教是面对大众的，佛教实际也是面对大众，但是同样两个都是面对大众的，而佛教为什么没有产生面对大众的哲学体系？中国的皇帝就有他的教育哲学，中国传统的“皇权”它需要的是两种支持力量：一种是管理内部事物的台阶；另一种是管理社会任务的。所以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他的教育哲学是为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中国主要的教育哲学就是儒家，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儒家的教育哲学有哪几个特点？我为什么强调儒家？因为我是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教育哲学没有跳入儒家的框架，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反对儒家、反传统。那么儒家的教育哲学有哪几个教育哲学？

第一个特点，儒家是规范性的教育哲学，而不是时政性的教育哲学，儒家它过分强调应当怎么样，使得儒家在很多方面过于理想化，儒家总不考虑它提出的理念是否能在现实世界实现。所以儒家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内部矛盾。一方面，它有强烈的意愿改造社会、建设一个好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它间接从规范出发，对现实社会到底是怎样的却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儒家改造社会的努力往往非常成问题，在没有对现实世界做解释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改造世界呢？所以说儒家教育哲学没有发掘出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体系，哲学始终停留在哲学层面，跟社会现实没有多大的关联。尤其是当现实社会的发展不能符合儒家的理想，儒家它不是说修正自己，更多的是积极干预和阻碍社会变迁。所以儒家缺少社会进步观念，并且自身的变迁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变迁。儒家和西方的自由主义相比较，西方自由主义有一个进步的观点，儒家是没有进步的观点。儒家是根据现在这些所存在的要素怎么来改进，所以儒家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统治哲学。

第二个特点，儒家的教育过程过硬，我们现在提倡孔子学院，好像儒家是

一个 Soft power, 一个软力量。但是我觉得儒家的教育过程非常硬, 儒家强调教育没有错, 但是儒家的教育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从理论上说人人可以成儒,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儒家, 但实际上就极少数人可以成儒, 也就是说儒家的灌输过程显得非常的硬。那么这个过程远远比西方个人宗教化的过程要困难得多, 西方的宗教是针对大众, 而中国儒家的对象是精英。西方人称儒家儒教, 我想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儒家是政治精英的, 而不是面对大众的。

第三个特点, 儒家提倡非常先进的思想, “有教无类”这个思想非常先进。与西方相比, 中国文化传统上并不强调民族、宗教、种族、阶级等一个人身份的因素, 因此它强调教育在塑造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它只有不同的两个群体: 一个是受过教育的, 一个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人都有权力接受教育, 人人也可以被改造好、被教育好, 这是非常好的思考。但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教无类”的思想传播到西方以后就发生出大众教育。今天我们从西方看到的大众教育就是中国“有教无类”的思想从文艺复兴传过去的产物, 那么中国本身“有教无类”思想存在几千年, 为什么没有产生出大众教育来?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四个特点, 它的边界专业主义问题也是有问题。知识应该是没有边界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传统儒家的教育哲学是有边界的, 就是它仅强调政治哲学、统治哲学, 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以另一方面, 儒家教育哲学没有明确确定知识的边界, 尤其是政治领域的边界, 它强调学者对政治的参与, 政治和学术之间没有边界, 经常导致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过分紧张。从知识体系发展的历史看, 我觉得知识的边界非常重要, 知识的目的就像知识; 就像做生意的人资本的问题就是更多的资本; 政治权力目标更多的是政治权力。所以因为儒家的边界没有建立起来, 儒家也没有发掘出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 儒家知识分子的功利主义精神过于强烈, 儒家资本主义非常功利。

第五个特点, 儒家缺少独立性, 没有对知识的认同, 没有明确的边界。在儒家缺少独立性, 没有自身知识体系的情况下, 儒家主要想依靠皇帝改造世界、依靠政治权力改造世界, 这就导致了对权力的过分依赖。没有独立性也就是不能形成知识分子的知识群体, 这对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领域的关系影响非常大。对皇权而言, 知识群体是个依附性群体, 这个群体千方百计为皇权提供有用的知识, 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个群体提供的知识实际非常有限。对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儒家又非常高傲, 儒家是把自己这个群体道德自我提高一点, 所以很多场合儒家就是训斥人的。士大夫这个阶层它是非常知识的一个群体, 社会是有等级的, 士、农、工、商, 儒家把自己放在首位, 而这个首位主要是儒家认为它掌握了社会所需要的道德。

第五个特点, 对社会而言, 儒家也没有进步观。儒家主要是着眼于现在的条件, 优化统治方式, 这里面没有进步观, 儒家强调统治哲学要跟着现实的变

化，而儒家里面没有追求变化的因素。因此，儒家历来是一种保守哲学，儒家的保守性也影响着和其他知识群体的关系。最近我在看《中国的科学发展史》，这里面有一点我觉得感触很深。因为中国传统几千年创造了非常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与其他社会相比，所有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最具有积累性的，是一点点积累起来，只有在中国经常出现科学倒退、知识倒退的情况。很多时候很多的科研被统治者烧掉毁掉，这是其他国家、其他社会都没有发生过的，我想这个是跟儒家有关系。因为当儒家看到它的一种技术，因为它自己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所以当一种知识看到现在统治者有矛盾了以后，它不是说改变现在的统治方式，而是毁掉那个新出现的东西，因为它把政治秩序提高到太高的位置，儒家一切均是为了政治秩序。

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儒家？儒家它对政治方面的关系又非常紧张，基本上从中国历史来看，秦始皇是儒身。当然，儒家也有变化，我蛮喜欢孔孟时代的儒家，他们过于规范现实是一方面，但是后面的儒家就改造自己，后来儒家进行自觉的改造，依附于皇权了。

但是中国真正有用的那个知识体系没有发掘出来，那就是法家。法家是强调时政的东西，但是很可惜，法家没有成为教育哲学，只是它很多的实际知识。我们现在看很多历史材料，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知识就是法家而不是儒家。

那么中国人的教育有没有哲学？商人也没有教育哲学。商人在传统的士、农、工、商是处于最后一位，它没有也不必允许发掘出自己的教育哲学来。商人阶层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儒家所承担的，中国皇权发掘出了很多方法削减商人的挑战。首先是把商人放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中国是不让商人壮大的，商人有钱了要买土地，所以要避免商人过度的财富对皇权威胁。同时，商人也被灌输“学而优”的思考，所以商人一定要把他的子女送给儒生教育。这就使得中国的商人对教育方面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这跟西方形成非常大的对比。

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跟商人绝对分不开，商人阶层在教育哲学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这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看：

第一，商人促成了教育和神学的分离，西方中世纪是宗教人学时代。人学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当时所谓的教育也就是人学教育，人学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文艺复兴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主义兴起导致人学时代终结。终结当然不是说人学不存在了，而是说人学不再占知识领域的主导地位。理性主义的兴起以及知识背景跟商人的建设和崛起是关键，商人是最讲究理性的，商业行为不能用人学来解决，新兴的商人阶层是站在文艺复兴的背后，没有商人阶层就不会有文艺复兴，是它经济力量的支撑。

第二，商人也促成了知识跟政府的分离，商人需要能够支持商业运行的知识运行，尤其是法律体系。同时，商人也担心政府的力量太大，知识和政治分

离对商人非常有利，知识界争取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商人是背后的推动和支持力量。所以在西方，大量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都是私立的，尤其在今天的美国到现在也是这样，这完全是商人的功劳，没有商人的支持西方难以发掘出这样独立的生产知识体系的机构。

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是这样，那么近代以来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些影响。中国教育哲学的变化近代以来和政治社会的变化是相关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分权，第二个是革命，这两个结构特征为教育哲学的变化创造了条件。首先是分权，在权力的分散上面，清末以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皇权衰落，但是新政权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历史上每次皇权衰落一样，权力的分散它导致思想界非常活跃。传统上，皇权衰落之后思想上尽管很活跃，但是还在传统的层面。那么清末之后，传统上皇权主导的儒家不再是主导性教育哲学，向西方学习成为风潮，这是一个特点。其次是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政权，那些导致革命和政治力量的人需要新的知识，他们也尽力输进新的教育体系和新的教育哲学。

这些变化也导致知识界的一些变化，主要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知识分子作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群体的意识产生。晚清取消科举制度是非常关键的转折，取消科举制度之后知识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一下不见了，而新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脱离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之一就是独立意识的出现；第二是政治和知识界的边界开始产生，五四运动以后，各种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体系相互竞争，政治力量对哲学体系、知识体系有所选择，但这并没有妨碍知识界对知识体系的追求。即使在蒋介石时代，这种政策和知识之间的边界也是存在的，蒋介石的政权非常专权，但这个边界并没有破坏掉。如果知识群体干预政治，那么蒋介石政权会参与干预，甚至镇压。

但如果知识界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权对知识界并没有过度的干预，那么这种新的发展给中国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学，造就了新的教育体系。多年的积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可以说达到一个顶峰。西南联大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界最优秀的人才，也为国家培养着大量的人才。而可惜的是，近代以来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对中国的教育界生根，所以在政权回归集权，教育界的一切又回去了。

前面我有意识的比较详细讨论儒家的教育哲学，主要是因为想说这种教育哲学仍然在占据中国当今的主流，尽管教育哲学的名称换了一下，换成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的概念。再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分析哲学、社会、经济的哲学，到了中国就变成一个道德哲学，现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道德的东西，大家都觉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教训人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分析的东西，所以它已经变形了。

我是非常同情中国的大学，我经常到珠江三角洲去看，我一看心非常沉重，

大学生竞争不过农民工。我看很多个招聘的，农民工他很现实，找到工作就拿走了，而大学生挑来挑去，最后一个工作都找不到。从工资水平上来说，稍微有技术的农民工反而比大学生高。所以前一段时间南方要南方搞科技大学，我就跟深圳市领导说，珠江三角洲如果是要搞产业升级，即便把北大、清华搬过去都没用，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大批的技术工艺人才。我曾经在美国波士顿生活过两年，它的工艺性学校的学费比哈佛还要高，可是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工资照样比哈佛还高。大家就忽视了这些与西方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我们像西方学习，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认识到西方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学。中国现在工厂找不到技术工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中国的教育产业本身是非常产业化的，但跟产业则毫无关系。

所以我们也比较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内地，我觉得这里面新加坡是非常成功的。它到今天为止，大量的学校是技术学校，培养技术人才，所以新加坡现在生产的产品附加值非常高。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岛国，它的人均 GDP 达到 5.2 万元。去年我们去台湾，马英九说九十年代中期台湾跟新加坡研究基地是一样的，现在连一半都不到。所以好多东西虽然知识分子有自由，但是照样没有他的知识体系。我们现在好多大学里面，好像受政治权力所阻碍，其实不是这样。

那么今天的中国，政治权力跟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过于紧张，基本上两者之间没有基本的信任，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是觉得中国的政治人物也不专业，知识分子也不专业，知识分子老想政治人物的事情，政治人物老害怕知识分子干预政治，这个边界就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教育界作为政治行政体制的一个延伸，而且政治和教育之间确立边界，政治行政改革我想是前提，却仅仅限于教育领域的改革无济于事，因为现在这么多年我们做了很多为教育内部的改革，但实际上我觉得效果并不大。

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权力方面也感觉到政治跟知识之间边界的重要性，这种边界的确立对政治权力非常有利。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人才的竞争、知识体系的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如何增加国家的竞争呢。那么在知识界的内部，知识发展的逻辑要求建立这一边界的确立，教育界如果继续处于依附地位，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知识发展本身很难成为教育界的主体。

那么说到底我们能够建立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改革？上面已经讨论过我们建立那么多的改革，但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和成效，大多数感觉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要建立有效的改革我建议同时做两件事情：首先要确定改革的目的，其次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改革的目标不能过多，过多就不是改革，所以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主义，专业主义应当是教育哲学的核心。现在教育制度和专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并不认为如果目

前的局面继续下去中国能够建立起专业主义，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不能另起炉灶，说这个不要了。也就是说专业主义的确立，是要通过改革现在体制而确立专业主义。那么如何在现在体制下确定专业主义？

我们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形成突破口：

首先，现在的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工资结构而转型，形成一个有利于专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工资结构。现在的教育学术研究领域国家的投入越来越多，知识创新能力越来越弱。为什么？这几年我们提倡很多，但是实际上客观的讲，中国的创新跟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好像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真正知识创新能力却越来越弱。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经济资源在这里边控制的作用而非知识创新。现在一个教育者或者研究人员基本工资非常低，基本工资还不能够体面的生活，更多的收入是要靠政府和额外的工作资金，现在国家财政的增加能够提供给教育的资金越来越多，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表面上看是鼓励和支持创新，但实际的效果刚好相反。

在其他国家，教育的主要甚至是全部工资都是基本工资，不需要去申请任何的资金，尽管政府鼓励他们去申请政府或者其他资金，但是他们觉得基本工资就可以了，这样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进行思考和研究。那么中国的工资制度，与其说是鼓励研究而不如说是政治行政控制，资源分配成为有关部门教育者的研究的有效手段。我跟有些大学的校长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工资结构不改一改？即使你改一下，总体工资不会增加国家任何负担，就把结构改一改就行了。现在中国资源大量浪费，学校里面校长、副校长、院长等有些人大量挥霍，但真正需要用钱的人没有。所以如果把工资结构改变一下，总体工资水平不会有多少变化，但是对知识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改变受到影响只是教育界当权者的利益，但收获最大的是知识界和知识本身。得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现在很多人只写文章，但没有人去思考问题。

第二，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评估制度必须重新设计，和工资制度一样。现行的各种评估体系完全是教育部门为了管理而设计，而不是为了鼓励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多评估体系是从国外输入。在国外，所有的评估体系都是专业主义的表现，是同行的行规，或者是为了鼓励知识创新和进步设计的制度。我考察过美国和欧洲的评估制度，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官僚的评估，人家都是专业的评估，而中国是官僚体系的评估。所以，教育评审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官僚手中转移到专业手中，教育和学术评审应当是自制的组织自我约束的有效机制，而不应当是官僚控制专业主义的机制。

第三，政治和知识之间边界的确立，不仅是行政当局的事情，更是知识界本身的事情，我们教育界自己要反省。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界有两种倾向性，主要的这种边界的确立需要我们反省：第一，很多场合知识界本身不想独立，而过度依赖权力和利益，很多人把教育和研究看成追求自己利益的职位，他们

对自己的专业很少有兴趣，因为他们从权力和利益那里获得很多的利，所以他们根本不想打破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有的人，说政治人物真的要控制你吗？也没有，我们好像自己都是追求控制。我是做过研究的，很多人就希望能不能给哪一个领导人做一点事情，哪一个领导在想什么事情。实际上，你真正要对政治有影响，那你不能为哪一个领导人着想，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去影响政策，你的影响可能是“零”。而你是研究实际问题的，并不是以影响哪一个领导人为目标的，那你就有影响，因为你可以把问题说清楚。所以我们那么多研究机构，都是想去影响哪些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浪费了很多的钱。

另一个群体恰恰相反，他们不满足现状，对权力保持批评态度，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群体不见得有专业精神、对专业感兴趣。我觉得他们不和权力合作，并不表明他们的独立性，无论是依附权力或者反对权力，知识界的目标都不是自己的专业主义，而是利益。这种局面不改变，再好的政治环境也无济于事。所以一定要改变，即使你民主化了，即使政府不管了，你也不见得能做出东西来。

这里我觉得教育界的自制和独立，并不是教育界可以无政府，这一点我要指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教育界是最具规则的一个领域，个人、系所、学院各个个体、各个组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必须加以归制。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仍然控制着教育界，但荒唐的是教育部内部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我看了一下，中国除了批评政府，中国的教授、学者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除了批评政治不行，有哪一点自由没有？教授、系所、学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要没有专业主义精神，他们什么品德都没有了。如果这种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如果教育界规范制度不能得以确认，那么无论怎么样的支持和制约都不会帮助专业主义的产生和发现。我们西方也好，亚洲也好，教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很多行为规范和规则，而我们学校里面什么规定都没有，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这样的话，中国的学校里面收入差异跟社会有什么区别，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在学校里面有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异有那么大的，所以整个的就是无政府状态。

那么要确立政治和知识界的边界，知识界本身必须确立知识的认同和知识的边界，除了那些敏感领域，知识界并没有什么阻碍要进行知识创新。非常好的是至少一部分学者中间学者的主体意识在产生和发现，这是个好的趋势。知识界必须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意识追求权力不可避免，但要意识到通过依附或者反对现在权力是对追求权力而言最无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加重知识和权力之间的依附关系紧张，而且有害于知识本身。最有效的方式是追求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本身可以成为权力的巨大资源，专业主义的本质是为了知识是为了知识，知识的目标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教育是解放人的个性、培养人的独立的精神，释放人的各种好奇心，从而激发创造。一个从事知识事业

的人，不应当过分注意自己创造的知识是否和社会政治、经济相关。但是如果解释世界，知识肯定是和世界相关的。如果没有这种对知识的独立品德的认同，那么就很难有知识的创造，也很难有教育家。

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面列举少数几个例子，来说明教育的变化可能对知识界带来的影响。很显然，正如其他领域，教育哲学的改革也要呼吁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不仅仅是政治行政而言，而且也是对知识界本身而言的。一个新教育哲学的确认，必然会最后导致一个新的教育局面出现。我刚才说了，允许我犯错误，谢谢大家！

第二部分：中国高等教育治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赵力涛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课题。我们这个课题主要的调研时间是 2011 年全年，我们选择了中国高校比较集中的几个城市，北京、西安、武汉、上海、杭州。我们同时也对来我们所访问的中国的一些高校领导和学者进行了访谈。我们主要使用的方法是访谈，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虽然我们也希望得到非常详细的统计数据或者抽样调查数据，但是对我们来说显然是非常的不现实，相比之下访谈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另外一个原因是访谈有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优势，也就是访谈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素材和丰富的故事，也可以帮我们提供深刻的洞察力，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以访谈为主。

关于访谈对象的分布，我们希望尽量广泛，所以既有“985 高校”，也有“211 高校”，也有一般的地方高校和民办的高校，独立学院。从职务来分布分类的话，有政府的官员，也有大学的领导，校级的到院系一级的，然后大学的教授、老师、学生，包括企业人力资源的主管我们也都有访谈到。我们关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大学的治理或者管理体制；第二个领域是知识生产或者叫做科研体制；第三块是人才培养的体制。

中国从管理体制来讲八十年代曾经有计划进行比较深层次的改革，当然后来没有进行下去，所以九十年代给我们的感觉，主要的思路是发展代替改革，或者发展就是改革，这导致了发展大于改革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大学的变化非常大，有一些变化确实也是积极的变化、好的变化，但是它也出现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所以就导致大家现在又来讨论大学改革需要向纵深突破。从文学纵深的角度来讲，这个讨论在两个议题之下进行，一部分是在大学行政化，就是最近几年讨论非常多，包括杨德广教授也做了很多访问，另外一部分是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个框架内也进行很多讨论。

中国高教学者认为中国的政府大学关系对于高教改革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昨天在北大教育学院的研讨会上，大多数人也认为大学行政化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这种共识在我们的访谈当中也得到了证实。我们问卷当中设计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认为中国高教改革不应该只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教育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管理教育的方式”，我们给他了几个选项，60%的人是选择了同意，就是外部治理结构比内部治理结构更加重要、更加优先。第二个问题是“请问您对大学相对于政府独立自主性的看法”，75%是选择了政府对大学管得太多、独立太少。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关注钱学森之问，所以我们也有一问题，就是“中国未能培养出世界级大师的首要原因”，我们也列了几个原因，比如说A是缺乏学术自由；B是经费投入不足；C是科研体制有问题；D是应试教育。结果大多数人选择了A缺乏学术自由，接下来的是科研体制，这两个选项是比较多的人选择。“对于未来的高教改革的方向”我们也列了很多选项，大多数的人认为最重要的改革应该是政府、高校之间的管理体制，其次是改革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所以这样的看法不仅仅是高教研究学者主流的看法，不是高教研究的学者在大学里面也持这样一种看法。

这个对我来说也不奇怪，但是我做这个项目的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大学的里面往外面看和从外面往里面看的看法差距比较大。从内往外看的话，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干预太多，或者是大学缺乏自主。从外往内看的话，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大学自己的问题，是学者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双方存在一个认知的差距。或者说从内往外看，高教的主要问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所以大家就认为如果制度不改的话好的学者也会变坏，这是从里面往外面看的一种观点。但从外面往里看的话，高教主要的主要问题是大学的问题、是学者的问题，也就是说光改制度的话，如果给大学增加自主性，那么你会不会滥用自主性。所以这是两种非常常见的观点。

因为两方面的观点认知差距非常大，那么我今天想讲的其实也非常简单，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认为制度有问题，那么这个制度的问题到底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学者有问题的话，那么学者的问题在哪里。我想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来探讨一下中国高教改革的一个思路。

第一，制度的问题。

有很多学者提出制度的问题在于权力，就是权力分配不当，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些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行政权力会主导学术权力？有的学者指出有两个制度上的原因，第一个是政府有任命高校领导人事的权力；第二个是政府提供经费、掌握财权。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因为如果观察的话，世界上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大学，他们的校长其实也是政府任命，然后办学的经费也是来自于政府，所以这并不会必然出现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与学

术权力边界不清的情况。

通过访谈，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触，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是大学是承担一个无限的或者一个全面的责任。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大学在中国它既是一个教育的组织、学术的组织，同时它也是政治的组织、经济的组织、社会的组织，那么这个大学到底是什么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加要命的是，很多责任其实并不是界定很清楚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只是经济责任或者政治责任，如果套用一句“外交无小事”的说法，那么在大学里是“大学无小事”，很多看起来很小的事情最后演变成很大的事情，导致你很难防范到底大学的注意力放在哪里，我想这个跟大学需要承担无限责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哪怕从制度上能够界定清楚，但操作起来还是分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大学承担这个无限责任之后有一个后果，就是责任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因为像我们如果熟悉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的话，我们其实就知道当时国有企业有很多目标之间是相互冲突的，现在大学也有这种特性。那么就是说在学校的内部，不管进行怎样的权力分配都解决不了这个不同责任相互冲突的问题，所以到最后哪怕你想分权，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还是会回到学校，学校主要领导会回到党政联席会议上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在大学内部即使有分权的安排，在实践当中集权往往会成为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还观察到大学承担无限责任，这容易导致大学治理当中个性比制度更加重要。所以如果从制度角度讲，大学要建立形式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很容易，就像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口号底下可以通过非常漂亮、非常完善的法律。但是很多制度即使设立，可能在高校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最终的根源是在大学承担的无限责任，也就是说有很多责任之间的冲突，大学的制度安排解决不了这样的冲突，所以最后会回到“人治”，因为“人治”是更加灵活处理不同责任之间相互冲突最好的方式。我们在访谈当中发现，对于大学管理来说，很多受访的人都提到学校领导的个性非常重要。有一个“985高校”的校长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他非常厉害，因为只有厉害才能够办事情。所以在一个无限责任的体系下，厉害的性格的个人特质与制度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厉害的话，那么你在学校里面的可能很多事情都解决不了。

所以无限责任为什么会大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这个无限责任制下，专业主义发展困难，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专业主义。专业主义只有在分工结构里才能够发展，有限责任是专业主义发展的前提。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也了解到，因为我们对人才选拔制度非常关心，有的研究表明说人才选拔对组织运作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也发现，在很多高校的人才选拔制度确实践行了“选贤与能”的这个原则，包括在座很多院系的领导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我们也通

过我们的访谈观察到有一些在院系领导的岗位，也就是说岗位决定的，岗位需要承担无限的责任，使得他们难以发挥专长，事物都得领导来过问，所以处理得不好的话就会有人闹事，会往上面打小报告。我在美国待了六年、在新加坡也待了很多年，这些高校和中国高校比起来，好像打小报告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特色，我想这肯定也跟无限责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一个无限责任体系底下，一个好的人才筛选制度好像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看起来，在无限责任的体系下大学行政化的这个趋势很难避免，大学承担无限责任我觉得它是容易导致“集权”，容易导致“人治”，就是不管制度设计成什么样，最后都会往这个趋势发展，道德承担无限责任的组织容易蜕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组织，就是因为责任太多，很难平衡。所以大学也不例外。再观察这个趋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非常重视大学的学术责任，这个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同时也重视大学的非学术责任，就是其他的责任它也非常强调。所以大学承担的责任非常多，也非常重，加剧了大学行政化的趋势。

第三个原因，我们在访谈当中也有访谈对象告诉我们，说校级领导的世代更替也加剧了行政化，这是我们没有想到一个意外听来的东西。他们举了例子，就是八十年代他们这个学校有一些学校的领导，比如说副校长或者党委的副书记可能是地方政府副省级的官员过来，副省级官员他不是毕业于这个学校，所以他们在八十年代对学校里的知识分子反而很尊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这个专业方面的人才。后来我们选拔制度时候强调专业出身，所以更加重视专业化和学术资历，就是那些名教授出身的知识分子担任领导甚至出任校长。根据他们的观察，教授治校行政化的程度可能还要更高，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学术上要高人一等，那么现在他们的权力也高人一等，所以很难再让他们尊敬曾经是同行而如今是下属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个看法有多大代表性可以讨论，但是这个蛮有洞查力的。也就是说现在校长不是自主权不够，而是自主权太多了，教授治校行政化程度反而高过了曾经的官员治校，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怪现象。但是正如我前面讨论的，就是筛选制度本身不是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无限责任体系底下教授治校会出现集聚、人治的行政化现象。另外的一个是单纯依靠控制和管理造成大学被动行政化不同，在国家资源诱导下，现在出现大学主动行政化的现象，这是一个更加另人担忧的现象。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没有为大学去行政化提供一个契机。如果我们留意观察的话，西方大学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地方，他们善于从外部关系拓展空间。欧洲早期的大学是在教会和王权之间寻找它的空间，美国的大学是在政府和市场中间寻找发展的动力，美国大学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结构，能够从市场和社会获得它需要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中国的高校现在已经开始从市场、从社会寻找资源。我们访谈过有的大学，现在对校友新的资源非常的重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感觉，整个市场和社会离成为大学外部关系第二级相距比较

远，最有能力从市场、社会获得资源的高校往往会从政府获得资源，所以它并不会因为从市场和社会获得资源就会疏远和政府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感觉中国的大学重视从外部获取资源，但是他们忽略对外部的责任，所以导致这个社会往往不是和高校站在一起、和大学站在一起，反而是社会和政府站在一起，用社会对大学的不满来加强对大学的问责。

我再简单讲一下民办高校，民办高校虽然在理论上建立不同的体制，与公办高校竞争，促进高教改革的新化。但是实际上，可能除了少数的大学，大多数的民办高校还没有解决生存的问题，不仅没有能够为公办高校去行政化解决问题，而出现向公办大学靠拢的趋向。这个原因可能也比较简单，就是中国的民办高校，它面临的是一个分割的社会，所以在公办高校已经掌握优秀的学生资源和教师资源的背景下，中国民办的高校能够利用市场和社会的资源相对有限，所以它在一个分化结构当中处得地位是相对不利的。比如很多学校没有能够开拓市场和社会资源，那么他们现在一个办法，就是为了生存问题，他们开始向政府寻求资源，我们访谈当中也了解到有一些民办高校出现向公办高校靠拢的现象。所以民办大学要想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靠回归体制、依附于体制内的资源取得成功；还是靠从社会和市场获得支持取得成功，这两种不同路径的成功对中国的高教改革的意义不一样的。独立学院是中国高教改革的创新或者说是一个“怪胎”，它和大学合并和扩招有明显的关系。

第二，学者的问题。

学者能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政府、推给制度？我们从昨天讨论到现在，我们觉得包括大学在内、学者在内，不能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制度推给政府。因为中国的大学发展史有一个表明，就是即使大学的外部环境很不利于这个大学的发展，那些身负使命感，就是有远见、有热情、有使命感的学者，他总能寻找到自主的空间，为学术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有学术的学者会对治理结构产生正面的影响，或者说他可以超越治理结构的约束而有非常卓越优秀的学术表现。大家也很容易观察到，在相同的治理结构下，比如说在美国或在者欧洲的很多大学治理结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但是有没有我们中国所说的学术代表人，这个会对大学、对这个系所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表现产生根本的影响，所以说学者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观察，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如果有声望、有名望的学者越多的话，那么它对一些很奇怪的改革措施的抵制越强，所以在中国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我们的访谈当中接触到中国真的有很好的学者虔诚于学术，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规模和影响力没有大到让他们成为大学“核心”的程度。有一些学者追求非学术的东西和社会上的评价，比如说学者官员化、老板化、明星化，这都影响社会对大学学者的总体评价。所以大家对大学的学者声望给予专业水

平的期待，如果学者做别的事情的话会影响学者的声望。这个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学术的评价机制或者人才选拔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国内学者这也有很多讨论。

在访谈当中，我们在做这个调查之前没有意识到，但是后来发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中国还存在课题动员的体制，课题对于中国大学的学者和对于学校的系所、学院或者学校的重要性简直难以想象，这个重要性远远超过在美国或者新加坡的大学的的重要性。学者每年要为申请课题、完成课题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访谈当中他们抱怨是为课题而课题，而不是处于学术兴趣，而是基于绩效考核和收入考虑。横向课题的有收入在内，纵向的是绩效考核。

我们访谈过一个受访者，他最近评上教授，我们就问他评上教授的感觉跟副教授有什么最大的不同。他的最大感受是当上教授以后，很多和课题有关的事情他可以不操心了，可以让副教授带领这个团队去忙。显然，在这样一个课题体制下，很多课题质量是成问题的，就是有一些课题生产的是学术垃圾而不是真正的知识。我们访谈过一个学院的院长，他自己说他从来不主动阅读课题报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是处于研究者真正的兴趣。我们也访谈到有些学者，他知道这个课题的局限性，所以他利用这个课题收集资料、做他自己想做的研究，所以这个学者也不完全受这个课题的约束。但是从忙的程度来说，这可能是中国大学的特色，也就是说课题体制，而且动员不仅是学者问题，而且是从上到下要动员这个学者去申请各种各样的课题。

所以很多学者说从开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走向被动的行政化或者被动的市场化。但是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他们尝到甜头以后，开始走向主动的行政化或者主动的市场化，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这个我们觉得对专业主义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被动行政化与被动市场化。其实你要观察学者的话，很多学者已经名益双收，所以当初的被动行政化和被动市场化的理由其实已经不存在，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一套新的价值观和文化，非常难以回头。显然，学者本身对于中国高教的很多问题会有直接的责任。

那么在认定制度和学者都有问题的情况下，中国高教的改革方向在哪里？前面郑教授介绍了，就是治理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大学的核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边界，建立专业主义，大学如果没有核心、没有边界的话，它其实很难承担外部的尽责。中国现在的情况可能和欧洲的大学有比较大的不同，欧洲大学过于重视自己的边界和传统，所以它对外部的变化反映比较迟钝，现在大学会有很多问题。那么中国高校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自己的边界和传统，所以中国治理改革的重点和欧美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中国大学首先需要建立自己的核心，才能够承担责任。西方已经有了这个核心，这个核心可能是过强，对外部环境不太敏感，所以需要加强它外部的问责。

那么大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追求知识和学术的学者，还有这些学

者体现的敬业精神。大学现在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教育质量、科研水平、人才培养等，我们都觉得这与大学核心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一块能够做起来，我们现在担心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大学核心的缺失既有制度的原因，也有学者的原因。也就是说大学制度方面是大学从无限责任组织变成一个有限责任组织，这样子就有利于大学发挥它专业组织的特长。学者方面也是要吸引优秀的人才，促进专业主义的敬业精神在大学的发展。

第三部分：中国高校知识创新体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祁冬涛

我认为高等教育哲学在经验层面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应该以何种机制生产何种知识和人才。这个问题在我的论文里拆分成两个，一个问题大学应该生产什么样的人才和知识；第二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机制生产人才和知识。我认为高等教育哲学在实践层面就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其实，我们会看到众多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大学学术力量都想回答这个问题，也都想让自己的答案具有最大的合法性。

我们的研究课题具体包含三种机制：第一部分是内外部治理机制，第二部分是教学机制，第三部分是科研机制。上午有一场会谈到了谁的高教哲学问题，到底是政府的高教哲学，还是市场的高教哲学，还是大学自己的高教哲学。我这里想阐述如下三个主要观点：

首先是在欧美等国家大学提供的答案具有最权威的合法性，我把这种权威的合法性称为“象牙塔传统”。这个“象牙塔”看起来是封闭的东西，大学的学术力量，哪些教师、学者在这个塔里，他自己决定用什么样的机制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和人才。然后我们理解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制度性的保障，它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话它必须有制度性的保障，这两个制度性的保障就是大学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目的是要保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保证自己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立场上具有权威的合法性，这是欧美等国家。据我观察，在中国是政府的答案最具有合法性，大学没有“象牙塔传统”，也就是说大学自己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自治和制度性保障比较弱，有政府的教育哲学，而无大学自己的教育哲学。然后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像上午我们提到了中国大学自己的哲学，建立具有专业主义、有限责任的大学核心和边界等问题，在我这篇研究当中我把它归结为建立大学的“象牙塔”，这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象牙塔”在中国的文化观念里好像是一种封闭性的、比较清高的、高高在上的传统，其实在西方曾经是这样的传统，但现在有很大的改变，下面我做

一些解释。

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如何理解中国高校以课题和项目为主的知识生产体制，我把中国高校的知识生产体制定义为课题和项目为主的知识生产体制，也就是说做课题、做项目是知识生产线当中最主要的生产线，它的课题和项目的成果就是中国高校的产品。并不是说中国高校所有的老师都在做课题和项目，而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想做课题做项目，都在追求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能控制大学的老师的学术时间，最起码从思想上精神上能控制，就是大家都想要这个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把它叫做“以课题和项目为主的知识生产体制”。

关于“课题和项目生产体制”我是这样分析的，我们要理解这个大学的课题和项目这种生产体制的话，要理解大学内的工分制。我相信这个大家也不陌生，要理解大学内部的工分制和项目课题体制，首先要理解中国大学的特征，中国大学的特征叫做“以资源和收入最大化为目的的事业单位”。要理解中国大学的特征的话，你得理解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就是政治性目标、学术性目标、发展性目标和行政化管理。那么要理解政府对大学这种非常独特目标管理的话，你得理解中国大学的演变过程。要理解中国大学演变过程这个特色的话，我们可能要把它放在欧美大学的演变过程里来理解。这是很大的一篇文章，用三万字不可能把方方面面写清楚，我只是提一个思路。然后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从源头开始。我想讲从欧美大学演变到用冲突的视角来进行观察，然后一步步走下来，最后谈到大学内的工分体制以及课题的项目机制。希望这个思路可以让大家理解工分体制、课题项目机制能够更加深刻一些。

下面我讲一下欧美大学的演变，欧美大学的演变过程。我相信在座很多是高教史专家，我读的文献也不多。但是我在文献当中就发现，理解欧美大学的演变有很多视角。可以从功能的视角来看，也就是说欧美大学的理性社会功能经过几百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冲突的视角。我为什么要用冲突的视角？这个冲突是什么？就是学术力量、行政力量、资本力量、社会力量的冲突。学术力量它建立了“象牙塔”，然后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和其他力量有一个斗争、一个合作，试图保卫“象牙塔”，同时也对“象牙塔”做调试，对自己的传统进行调试。为什么要用这个视角？因为这个视角比较适合对比中国，中国没有这个过程，中国是控制依附型的体制，这种演变过程。所以我是从这个视角去观察的，我把它总结为：建立“象牙塔”、保卫“象牙塔”。

建立“象牙塔”始于中世纪大学，学者希望能够自由研究学问，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的神学不是教会的神学，教会所宣扬的世面上的神学是神学的一部分，他们要研究更高深的神学。所以说他们既然用王权的力量，就是像王室、王权取得“特殊权利”，然后得到王权的一些保护，使他们能够一定程度上独

立于教会的控制。同时，他们为了对付王权，他们也借用教会的力量，所以它是在夹缝中互相利用、互相制衡的一种。然后慢慢发展出来是王权或者是国家的力量比较认可它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这样一种理想、这样一种方向，制定很多法律保护，不让教会、市场、社会力量过度干预大学。所以基本上慢慢演变到十九世纪研究型大学，就根据所谓的洪堡理想建立德国的洪堡大学。洪堡理想、洪堡大学的这个研究型大学的一个特点，是从哲学层面、从神学变成了所谓的实证科学。

另外一个现代大学很重要的特征，它是研究基础性的知识，研究的是纯科学、纯学术。比如说当时的工业化开始了，它需要很多专业性技术人员，但是洪堡大学拒绝生产这些。比如说课堂里设计只是讲授基础科学、纯科学，不教你学专业性知识、技术性知识。所以说国家也没办法，因为它有自治和自由的传统，只能从洪堡大学之外设立专业性的技术学院，这些专业性的学院后来发展很好，成为德国非常有名的工业大学，和纯学术的、纯粹基础性知识的大学有这样一个区别。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它们有一个“象牙塔”传统，这里面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目标，生产什么样的人、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国家来保护它。

二战之后欧美大学的改变是改造“象牙塔”的过程。刚才上午的时候力涛提到“象牙塔”，它是学术的力量，知识分子当然想坚守自己的“象牙塔”，在这里面决定大学的目标、大学自己的生产机制。但是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工业化、全球化、现代化以至于进入了后现代化，社会各种组织都开始分化，开始功能进行复杂化，大学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所以说其实社会各方的力量，比如说行政的力量，就是来自政府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民意的力量，都试图让大学按照自己的理解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和知识。所以我们观察二战以后大学的演变，可以把它总结为所谓的行政力量、资本力量、民意力量试图进入大学改造“象牙塔”这个过程。

这里面影响因素我总结了几点。第一个是大众化高教，大众化高教它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原来是精英教育，大众化无法进行精英教育，因为学术人数增加，稀释了精英教育的资源。六十年代欧美存在的所谓青年造反运动，欧洲大学生造反很重要的内容是他们抱怨他们和教授直接见面聊天的机会减少，他们要求和最资深的教授来聊天，这是一个大众化教育带来的后果。第二个大众化高教带来的后果，比方说原来精英型教育出来的毕业生就业不成问题，就业成为问题劳动力的市场对大学就有影响，不能按照原来的培训方法培育出一些高深人才，然后在市场上找不到位置。所以慢慢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进入大学，开始改造“象牙塔”的传统。

还有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青年反叛运动中，过去比如欧洲大学“象牙塔”传统是资深教授组成委员会组成大学，学术权威也是行政权威。但是在六十年代

反叛运动中，大学生还有年轻教师就不答应了，所以当时在欧洲大学风潮组成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让大学生和青年教师都能够参与进去，不仅是这些资深教授“统治”这大学，所以这个“象牙塔”慢慢在变。

还有一个更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新功能管理改革。新自由主义大家都知道，就是崇尚自由市场、崇尚竞争。欧洲一直比较愿意效仿美国，欧洲在公共管理方面也要学美国，他们试图把市场、竞争、创新、企业家精神等都引入公共部门，来指导包括大学公共部门的改革，这样也促进大学“象牙塔”的改变。可最终结果却是政府放权，至于政府为什么放权，其实政府想让这个大学履行职责，所以权责相当，它一方面放权，一方面加大问责，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指标体系来监测大学的成果。另外一方面，大学承担的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政府的投入倒是越来越少，大学财政来源多元化和市场化。

关于学术资本主义的意思就是说让大学慢慢不依靠市场来获得资源的时候，它必须让自己的知识产品具有盈利能力。那么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盈利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所谓的学术资本主义出来了。然后大学的管理企业化，也就是说把管企业的管理方法引入大学，要强调领导力、创新力、客户为中心的管理方法，对客户需求的及时反映等。

其实经过这么多变化，现在大学制度仍然在演变过程当中，我们上午提到一个问题，到底西方大学制度是个什么？现代大学制度是个什么？第一，我认为西方没有对现代大学的定义，没有人谈这个概念，我估计这确实是国内学者发明出来的。第二个，按照我的观点来理解的话，我认为它是“象牙塔”与企业的合二为一，就是独立自主的学术力量试图引入企业的管理方法，试图和市场衔接。那么这个演变过程到底是“象牙塔”的成份越来越多，还是市场企业的成份越来越多？现在它的趋势是市场的成份、企业的成份越来越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西方大学没有丢失“象牙塔”的传统，它的“象牙塔”一直在那坚守，一直在和各方面力量做斗争，所以这是我想强调的。而中国没有这个“象牙塔”，没有教育学者、没有专业主义，所以它没有办法抵御所有的外在力量，没有办法抵御行政力量，没有办法抵御经济力量，没办法抵御社会力量。

所以在国际上来看，西方“象牙塔”面临巨大的挑战，它们也存在一种认同危机。专业精神的一个核心就是认同，就是说我是谁，我是个老师我就该去教书育人，这是专业主义的一个精神内核。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应该怎么样，如果我是一个官员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就是和你职业相符合的精神叫专业主义精神。但是现在西方大学“象牙塔”面临很大的挑战，身份产生问题，有很多冲突，中国不能盲目学习。

中国大学演变我简单讲一下，改革开放前高度政治化，控制防止“象牙塔”产生，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包括文革，摧毁“象牙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这种政府的改革迹象，试图建立“象牙塔”，一方面政府有分权，另一方面

校内实行校长负责制。在 89 年的政治风波过程当中是很好的观察大学和政治边界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什么意思？大学没有处理好和政治之间的边界。大学要不要上街，要不要停课，要不要绝食，要不要回学校，存在很多争论，不仅政府在这方面有答案，大学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反思的话当时到底应该怎么做，大学和政治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个值得大家反思的问题。89 年风波以后我们的体制性改革基本被政府认为是失败的，为什么？他们认为体制性改革后果是让大学进入政治太深。所以政府扭转体制性改革方向，但是又不能不改，所以换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所谓发展型改革。发展型改革在座很多学者认为不是改革，但是政府肯定认为还是改革，所以我在改革上加了引号，就是所谓的发展型改革。新改革是试图建立大学的“象牙塔”和学术自由。发展型改革是追求数量、规模和声望，造成行政市场社会力量冲入校园。

发展型改革中政府对大学的目标与管理。政治性目标原来比如说是红，红就是政治性目标，对党和政府有意识形态的忠诚，但现在的政治性目标很松，不黑就行了。其实给了中国高校很大的政治上的自由度。所以中国高校很多问题不是政治化的问题，当然，政治化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也不完全是。学术性的目标就是所谓的一流，国际上我们要建立“985”到世界大学，国内要建立“211”工程，是学术性目标，不是发展性目标。然后它为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建立了一大套的指标项目体系，指标项目体系在我文章当中分成三个方面分析，第一个方面是等级，第二个是标准，第三个是指标背后是资源。对于政府来讲，这个指标项目体系就是它的质量控制体系，它认为只要你达到了指标就达到了质量上的保证。

这里边可能昨天有人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其实对高校放权已经很多，但是我们观察另外一方面，同时，政府在另外一方面建立更为庞大的指标项目体系，用资源诱使大学往这个方向爬。中国大学的特征就是这个指标体系，以资源和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事业单位。我用一个比喻，就是政府的指标项目网就是蜘蛛网，我们高校和教师就是支柱，项目白吃白喝的资源是网上的昆虫，老师为了得到资源就得不断往上爬，肚子饿才有动力爬，所以基本工资要低。

为什么民办高校都会学公立大学？为什么也要跟着这个指标项目爬？很简单，因为指标项目爬得越高，得到的政府资源越多，然后向社会和市场传递的信号是证明大学里边你处在很高的位置，因为中国老百姓和企业家普遍接受的是政府建立的声望体系，所以民办高校会跟着公立高校一块在蜘蛛网上爬。

下面说到高校内以课题项目为主的知识生产体制，项目网被层层转嫁到教师身上，基本上实行了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工分制，就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大方面分成可以打分的细化项目，然后给老师打分，打分高收入就高、职称更高。课题项目对于教师的重要性是因为课题项目在工分体制当中占据非

常重要的位置，它可以让工分打得高，增加你的收入，保证你的职称。同时，中国的政界、学界和商界是混为一谈的，你必须利用各个方面的关系作为一个学者在政商学三界当中才能发展得最好。所以干课题、做项目是非常好的建立关系、维护关系的一种机制，所以说学者们一般不会抛弃课题和项目。

然后对于年轻学者来讲，他们的基本工资收入很低，他们不得不靠项目作为隐形补贴，所以做项目对于教师非常重要。问题就是说从选题到申请、到评审等各个环节都充斥着政治化，意识形态太强、政策性太强、学术性不强，还有一些学术权威。中国学界长期封闭于西方学界，这些学术权威会在选题上、申请上和评审上都会占据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很多年轻学者尤其是海归学者都会抱怨选题的申请、评审环节政策性太强，政治性太强、学术性不强，没有眼光等等这样的抱怨。

下面一个是说学术出版市场，因为这个学术出版市场也很有意思，西方学术出版市场没有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是中国人加进去的。人家基本都是非盈利的，当然，有盈利性的出版机构，但是被学者认可的是大学的出版机构是非盈利的，以学术评价为目的，但是中国的所有出版社都是公司化，所以中国的出版市场是百分之百的市场，金钱化了，所以买版面、买书号等充斥学术出版市场。因为学术出版市场不能真正履行功能，所以中国在这样一套体系下生产的知识到底有多高很难评价。政府创造一套评价的机制，比如说评审等等各种各样的大奖，但是它没有一个学术出版同行的评审的机制，所以也不知道知识的质量到底怎么样。这个最后的后果就是学者们开始主动依附项目课题体制。

我很简单的提一些反思和改革思路。上午讲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几个报告观察，中国缺乏教育哲学、缺乏专业精神，无限责任而不是有限责任，缺乏“象牙塔”这样一个体系。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的话，我相信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特点是先给它建立起大学、先建立起“象牙塔”、先建立起专业主义，然后再谈现代，不要轻易学西方的。因为你没有一个“象牙塔”、没有内核的时候，很多东西学过来都走样了，比如英国的指标监控体系等等。

然后不去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很有趣的东西，中国自己人做出来的东西就有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肯定是说给外国人说的，因为我们自己说不必讲中国特色。但是外国人根据我的接触，根据我看到的東西，外国人对这个中国特色非常敏感、非常抵触应该说是，你就是从这个公关的角度来讲不应该强调和别人过多的不同，因为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和冲击，所以基本上先强调大学再强调现代，不必要强调中国特色。

我提了几条建立“象牙塔”的意见，第一条就是降低教师的各种非学术力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工资的问题就是这个，学者对各种各样非学术力量的依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上的依赖，当然，对社会力量依赖往往和经济的依赖有些区别，因为有些学者愿意做明星，希望有很多粉丝包围着，这种追求不是经济

上的依赖，而是一种名望上的追求和依赖。但是根本上讲，学术的力量对市场、对社会经济上的依赖是根本依赖，所以应该降低教师在非学术在经济上的依赖。另外一方面是减少政府对学校的指标项目，等级真的不是目的，等级的目的是为了管理和分配资源，现在基本把等级完全当成一个目的来做，这个真的危害性太大了。第三个是内部增加对教师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出版市场的治理。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接下来政策建议里面我们详细谈的时候可以具体化。

第四部分：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体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祁冬涛

我想拿台湾作为一个例子讲一下高校改革的复杂性，因为私下里聊天有的学者也谈到台湾是不是对中国有启发，启发肯定是有的，台湾跟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台湾高教改革的背景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民主化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就是当时社会从87年后推动很大。

当然，它从整个洪流来讲互相促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整个民主化背景下台湾社会运动非常发达，社会运动反映了社会偏好的非理智性，社会运动产生很大的民意压力，它不一定是纯粹理性的，不一定经过非常成熟的思考的，社会运动有这样的特点。在维权社会我们往往对社会运动给予很高的期望，但是其实社会运动不一定导致很理性的结果。台湾的高教既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又产生了消极的结果。

当时的社会运动，比如说台湾高教改革是1994年大的流行，当时全台湾200多个高教团体结合3万多人，在台北市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当时提出口号是广设高中大学，因为他们认为教育权力是人人享受的权力，高教权力也一样，人人都应该享受高等教育权力。从劳动密集型发展成资本密集型产业，又要进一步往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这个时候政府需要更多的人才，同意高校扩张和升级的思路，所以在当时社会运动压力下，广设高中大学基本被政府接受了。然后95年成立改革教育委员会，花3年时间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其中一块就是高教改革建议。

在这个背景下，成功方面是大学建立了“象牙塔”，因为原来国民党对台湾大学，它里面有军事政工人员，没有正规的党组织，但是也有方方面面的监控，老师的课题也受到政府的钳制。经过大学松绑以后建立了“象牙塔”。但是另外一方面和台湾民主化发展过程有关系，因为九十年代甚至陈水扁上台以后不是特别成熟的时期，政治开始进入大学校园，大学里面很多老师分成两派，

蓝的和绿的，分化非常严重。当时我做自己的博士论文，06-07年在台湾待了7个月，那时候感觉真的是太明显了，因为靠颜色区分，然后互相之间不说话，那种感觉非常难受。这个让我感觉很惊讶，大学有了学术自由以后不一定和政治边界搞得很清楚。

不过08年以后再去的话有一些好转了，因为依附于不同大学学者也开始理解政治怎么回事了，每个政党都有机会上台，有可能下台，这样不必为了自己所支持的政党那么去维护它。所以慢慢的等到民主化成熟了以后，可能政治边界不清的问题会解决一些，这是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另外一个不好的方面，他接受广设高中大学的后果以后，短短十年之间大学增加一倍，现在170多所了。第二个问题是他也是升级，没有这么多的层次，三本升二本，一本升“211”，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它也是专业性的技术学院升级成大学，和中国几乎是一模一样。但因为台湾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导致其生源稀缺的问题严重，多数大学很快就倒闭了。第二个是大学毕业生成为失业率最高的群体，毛入学率达到86%，带来的后果是大学毕业生成为失业率最高的群体，从03-09年都是这样，09年是第二高的。我觉得它这个可能比中国大陆还严重，就是它数据是明确显示是一种比那些受过高中教育甚至是初中教育人的失业率还高。

还有一个原因，高教为什么复杂？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和政治有关系，和经济有关系。台商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大陆，开设工厂，在大陆赚钱很容易，不必发展内部的产业，所以台湾内部产业升级非常慢，造成台湾内部工作机会比较少，他们要升级的高科技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结果造成顶尖人才大量外流。这和高校扩招以后产生大量的毕业生有关系，因为大学毕业生期望更高，根据我收集到的数据来看，他们在岗位上的过渡培养率已经达到40%，也就是说40%的人是过渡教育，这也是它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和中国非常类似的，和“985”非常类似的，就是他们在几年提出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然后挑了几所大学来试图5年注入500亿，能够让这些大学变成世界一流大学。结果这个时候因为无法监测，比如台大国际排名提高了五六名，但是也不能就说它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所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反抗，然后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纠正方案。

所以我就想讲，就是高教改革确实很复杂，刚才和几位老师谈了，就是说它和政治有关系，也和经济有关系。校长说“我培养出来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和我有什么关系呀”，从某种角度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国家经济发展处在衰退期，再好的毕业生也可能找不到工作，确实有这样的问題。下面我两位同事一个先谈一下高校扩招后的结构问题，另外一个同事谈高校内部人才培养的问题。

(一) 高等教育结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黄彦杰

刚才已经从中西比较的历史和教育理念的方面阐述了我们这个项目的理论框架，所以我们这个关于人才培养体制的分析会主要是实证性的分析而不是理论的分析。而且我们研究报告的重点会重视普通大学而不是重点大学，包括独立和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情况，因为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这样一些非重点学校里面展开的。

我们这个报告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高等教育的整体布局结构；第二个是培养的具体问题；第三个是人才产出、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看高教布局的基本问题。中国是发展型的改革，那么用一个词语定义就是扩张。高校的扩张如果我们再仔细划分，它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是综合化的趋势，就是求大、求全、求热门，这不仅是从数量上看，招生数量上看或者学科的设置上看，可以说从高教的每一个方面，从经费到数量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扩张和求大求全的过程。第二个是升级化，就是高校在行政等级当中的地位上升，这往往跟教育管理部门的关系，还有教育管理部门对它的定义，专科升本科、二本升一本等。高校扩张以后我们看到的高校布局是三元结构，由公立高校为主的，然后民办和独立高校为辅。不同类型的高校它们的特点和扩张结果都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扩张的逻辑和规模，也就是说对于不同所有院校的扩张都是类似结构，第一个是专业扩张程度不一样。我们研究发现管理学和中文、英语、计算机的扩张比较大、程度比较高，管理学院首当其冲，从原来占本科招生率的 14.5% 到后来 2010 年的 22%，所以从招生数量上已经扩张了 10 倍左右。那么因为每个专业的扩张程度不一样，所以导致大学本科、专科专业设置结构的变化。大概结构是我刚才说的扩张比较快的专业占得份额变大了，而那些扩张比较慢的专业，特别是投资要求比较多的专业占比在下降。

扩张的动力学是什么？我认为中国高教等级制度某种程度复制了中国行政管理体系以及中国社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金字塔的不平衡模式，它最上面的是综合性的重点大学，再下面是非重点的，再下面是二本、三本，再下面是体系外的边缘化的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在这种动力结构下面，只有综合性的重点大学能拿到最多的资源，像赵老师上午提到的专门拨款，主要项综合性重点大学流动。所以所有学校把综合性重点大学作为他们的模板，这是动力来源。

那么综合化和升级会是怎么样不断成为一个延续的过程呢？它需要再生

产的过程，首先通过扩张设置学科和部门，然后通过部门和学科吸取公共资源，然后生产出新的知识和人才，然后用这个作为他们达到目标的标准，然后申请更多的学科和部门，然后进行下一门扩张，所以这个扩张本身是可以再生产的，就是不断的重复下去。同时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部门利益作为扩张的推手，因为当你把这个蛋糕做大以后，所有在这个部门里工作的人员，从领导到几乎所有的这些教授和年轻的教职工可以分到利益。第二个是扩张的经济学，低成本、低风险、收入快的通用型专业的扩张是最快的。

那么扩张对于不同类型的高校的影响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个里面我们认为非动力的公立高校受到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是扩张的问题最严重的。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教学资源紧张，有的把行政级别提高了，所以实际的资源不够，那么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就像我们说的所谓文凭的贬值。然后是不同高校之间的距离拉大，行政级别最高的有副省级的重点高校，他们不仅能够拿到最多的资源，也有足够的行政能力去阻挡教育对他们的干预，他们也能够拿到多的社会资源，所以他们的扩张相对是比较小的。有一些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招生甚至是年年在缩编，所以它的教学质量相比之下有所上升，这样造成重点高校和非重点高校之间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毕业以后去向的巨大差距。

独立学院本在资源禀赋方面继承很多公立高校的特点和优势，师资、土地，它跟公立高校有很强的趋同效应，民办高校虽然都是依赖于民间资本，但是相比之下民办高校在课题的设置方面市场化程度更高，而且他们在学生监管方面有一些比独立学院更明显的投入和新的制度创新。那么在资源禀赋方面，民办高校相比公立高校和独立学院都要弱一些，特别是我们发现由于教育部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对于土地的规定，所以民办高校在土地方面的成本普遍比公立和独立学院高一些，在制度环境方面面临的环境恶劣一些。

所以民办高校相比之下它的人才培养方面更加市场化、更灵活，但是它在扩张方面面临限制也是最严重的。最后我们还发现在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模仿公立高校，也就是说虽然它们都是比较市场化的运作，但是它们为了在社会上赢得更高的声望，所以某种程度上必须被被迫的去扩张。比如说设立硕士点，因为大多数社会上的人认为如果你有更多更高学科点，就意味着你有更高的声望，你的教育质量也就更高。所以很大程度上他们之所以也参与到扩张过程中，是因为社会偏好的原因。

(二) 高校内部人才培养与教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翁翠芬

高校人才培养一般都是有两个基本的目标：一个是培养出合格的公民；另外一个是为市场培养出合格的劳动力。

那么从国际上，人才培养的主流是高校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相对独立的培养本校的人才。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作用是以法律的形式界定高校系统边界及基本原则，而不是过度干扰高校的自主性。

从中国的现实上看，人才培养这两个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很好的实现，首先是培养公民的目标被取代，其次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单位招不到所需人才的矛盾。那么我们这部分将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高校人才培养的问题。首先是资源的投入和分配的问题；第二个是具体的教学培养过程；最后是学生素质的评估问题。

一、教育资源的投入与分配。

第一，校间的资源分配过于失衡。少数学校获得国家大力拨款，但是他们培养本科生数量一直在缩减。

第二，学校内部资源失衡。其中一方面是行政投入远远高于教学投入，我们调研的一所重点高校是赤字上亿元建立非常豪华的行政办公楼，但是他们的教师待遇和学术宿舍相对比较差，而且这些投入在最近几年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这个问题在普通的地方院校也是存在的，本来教育资源就比较有限，但是还是把教育资源用在扩大校区。所以行政投入高于教学投入这个问题在普通高校中产生的结果比重点高校更为严重。造成的另外一个结果是由于他们教学资源有限，就大量扩招成本低、收效快的科目，培养大量通用型人才，这些学生一毕业到市场面临很严重的就业问题。

第三，不同院系间教学资源差距比较大。

二、高等教育公平问题。

国内很多学者做了详细的实证研究，中国越是精英大学，其中弱势学生比例越少，弱势学生过度集中在普通高校。普通高校的教学资源非常有限，但是他们其实是上一轮扩招中的主力，所以这些集中在普通高校的弱势学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非常有限。而且这些弱势学生毕业以后，到了劳动力市场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一方面没有关系，进不了国家单位；另一方面，他们又竞争不过精英大学的其他学生，但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期望值很高，所以他们有时候宁愿不就业在家，也不愿意到企业做一线的员工。

这里我还想强调的一个是高校的自主招生问题更是为了很多优势学生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弱势学生没有资源去培养自己各方面的特长使自己在自主

招生政策中突出。自主招生一开始受到社会很大的质疑，因为大家觉得招生过程不透明，容易产生腐败现象。清华大学推出自强计划，面对 500 多个贫困县中学推荐优秀的学生参加清华的最终战胜征选，但是这并没有解决自主招生的不公平问题。所以即使它的招生对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它本身不公平的问题。

三、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过度的政治化。这个培养模式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大学生在校时热衷于权力游戏、学生观。但是另外一些大学生完全政治冷漠，只关心个人的发展，不关心整个中国的政治状况缺乏社会责任感，所以过度政治化其实是使高校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很好的实现。

四、高校教师重视科研，轻视教学。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高校的评价体系特别重视获奖项目的科研项目，大多数高校教师为了提高他们的收入只能在科研上花精力。这个我们在调研中大多数受访者比较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很多学生反映，他们觉得虽然老师自己本身水平很高，但是他们并没有重视自己的教学，导致课堂教学质量不是特别高，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就在下面睡觉。

五、现在许多年轻的教师被安排很多的教学任务，有资历的教师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和第二职业。这种情况跟学生需求相反，因为年轻的教师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科研，把自己的学术积累以后通过教学的形式传述给学生，资历比较高的教师更有资格把自己的经验传述给学生。

六、关于学术素质评估。教学质量评估过度行政化，因为教学评估主要是由教育部门组织的，缺乏独立的专业组织的参与，评估过程中我们的调研发现了各种腐败造假成风，严重影响高校内的风气。而且本科教学评估对各个类型、各个层次的高校都采用同一套指标，无法体现各个校的办学特色。

七、高等教育的 GDP 主义。教育部教学评估 19 项指标里有 13 项在强调资源投入与课程设置，只有 6 项指标是关于教学效果评估。这里面有一项是就业，就业是最受重视的，所以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就业率是占最大的比重的。这样的评估导向导致了高等教育的 GDP 主义，各高校都想方设法地争取资源，很少关注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于具体问题的介绍就到这里，接下来由黄彦杰为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就业市场与人才培养的问题。

(三) 就业市场与人才培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黄彦杰

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宏观的层面，看一看刚才那些具体的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宏观后果。

首先，我想反映一下作为我们调查的十几位雇主对中国高校毕业生的看

法。这是一种典型的看法，找一个合格的县长比找100个合格的文秘要难得多，县长就是在技术操作上管理一个生产线的基层生产管理人员。这个反映什么问题呢？就我们调研而言，多数雇主主要反映是毕业生素质的难题，毕业生在知识和素质两个层面上，他们与工作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第二个可能也是更严重的一个方面，毕业生的心理素质和他们的工作劳动价值，与实际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他们所需要的心理和价值是不相称的。

那么我们首先看知识和技术层面。知识和技术层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毕业生工作能力普遍低于岗位的要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知识形式化太严重了，与真正的职场上的需要完全脱节，另外一方面是他们的专业训练和工作环境也不符合。这种情况下雇主们一般采取的策略是用声望变成他们选人的主要标准，所谓声望标准就是第一轮选择几乎完全看大学生，不管他们的成绩、专业等条件。复旦大学毕业生第一轮有90%的可能性进入第二轮选拔，非重点大学只有10%-20%的可能性。这点联系到我们前面讲的，声望在扩张中起到关键作用，基本上形成恶性循环。由于声望和行政主导了扩张过程，这个扩张过程导致非重点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然后教育质量下降又导致雇主采用以声望为主的聘人的方法，结果是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下面是雇主对学生的伦理层次、价值层面和他们心理层面的一些看法。他们普遍的看法是用中国大学毕业生普遍缺少工作伦理和职业规划，这里面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非重点大学毕业生普遍不能接受难一点的工作。哪怕让他们去做了县长或者技术工人，他可能做了三四个月就溜走再找其他的工作，找其他工作又做三四个月。另外一个特点是营销或者管理人员找销售的工作，销售部门工作的人大概70%的人在6个月之内又换工作，这样一来就形成就业市场普遍的过度流动性。而那些真正需要招人的单位却发现非常难组织一个比较稳定的人才队伍和劳动力，所以结果是他们的培养体系非常难以维持，因为谁也不愿意出钱为竞争对手和公司培养人才，所以海外的中小企业在中国很难立足，因为中层人才非常难找到。这样一来就形成一种无法找到满意工作，也无法把他们的知识科技用在职场上的夹心层。

另外一方面我们普遍发现敬业精神和专业意识缺失，毕业生毕业以后普遍追求短期利益，工作态度倾向于自由散漫，对他工作的公司没有忠诚度。一方面反映重点大学毕业生追求铁饭碗，三年的研究生大概只读一年半，然后其他的时间主要用来考证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公务员考试和招聘考试。最重视的位置是垄断央企和国家公务员，其次就是省级公务员，然后就是市级公务员，在这之外再去考虑其他的工作机会。这样一来等于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到不需要创造力的部门去了。另外是非重点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职场机会主义，就是他可能找到了工作，但是只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经过培训获得经验以后马上又找另外一个工作，找到另外一个工作以后又想找另外一个，所以这样既没有计划

也没有忠诚度，是非常普遍的机会主义行为。

雇主他也有他自己的策略，有个海外的雇主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模仿中国的大学建立政治控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学生的头脑，然后控制他当租车。实际上这不是天方夜谭，因为据一项调查反映，最近几年大学生传销是非常严重的，传销组织 80%成员是甚至包括在校大学生在内的。所以这是跟普遍的工作伦理和专业精神缺失有关。学生方面基本反映了我们刚才我们在讨论教育时候讨论的问题，学生普遍反映非专业课时间占用太多。第二个是大部分老师精力不在教学，特别是研究能力比较强的教师，再就是技术型与应用型学科完全与企业需求脱节。

宏观层面高教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匹配偏差，也就是说大学生毕业以后的期望与实际收入和职业选择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差距。首先我们看看高校毕业生劳动力的特点，它的特点是规模特别巨大，但是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没有形成分门别类的专业队伍，没有人说法律人才、医学人才或者营销人才，各种按照专业分门别类的人才队伍，一个人可能干这种事也干那种事，然后在几个月之内普遍的存在机会主义的行为，就是找了这样一项工作，然后可能过几个月又找另外一项工作，可能过了几年也没有稳定下来。那么这样一种特征就跟中国产业升级的需要是完全相违背的，因为产业升级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级技术工人，而中国目前高级技术工人队伍非常少。据某一项估计是 400 万，但是其他的数据有估计是 1000 万，相当于一两年大学毕业生的总数。高级技术工人水平跟印度是一个水平，也就是说虽然印度基础教育或者高等教育普遍落后于中国，但是中国在高等技术工人的水平上跟印度水平差不多，而远远落后于像日本、韩国这样发达国家，甚至像泰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国。

也就是说有设备，也有知识背景，但是他实际操作能力，特别是那些需要自己在实践中有创造或者有发明的技术工人非常缺少，他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产业升级的瓶颈。因为很复杂很大的机械制造像汽车或者飞机，它除了需要很高的技术人才以外，它还需要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的高技术人才。

那么高技术人才匮乏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高校的扩张对于职业教育体系的破坏。特别是综合化和升级化，基本摧毁了原来比较好的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他们升级以后培养的专业人才反而减少了。第二个是高技术人才的匮乏有一个体制性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是按照声望和行政等级，而不是按照功能分类原则组织的，所以它的人才培养是按照声望和行政等级分级，而不是分门别类培养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毕业的人才为什么是人才？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被社会和政府认可是高质量的人才。

最后，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培养体系的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

个社会后果首先就反映在低质量就业。中国现在高校毕业生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所谓的低质量就业，所谓的低质量就业就是你虽然有了工作，但是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小，生活压力非常大，心理状况普遍不佳。还有一个是就业也不是很稳定，就是我刚才说的机会主义，它的结果是造成这样一批在产业升级或者社会发展中的夹心层。这种夹心层里面最有名的是“蚁族”的概念，就是在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周边的，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大学毕业生。一方面，他们在心理上把自己定义为都市白领，将来的中产人士或者专业人士，但是同时他们的教育赋予他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和他们的专业精神远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所以只能暂时接受底层生活的这样一种现实。

『政策建议与讨论』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辉耀

中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子都在教育上，不管是公民的培养、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人才的培养或是中国人才国际化等等，说到最后都是教育的问题。所以今天讲的几个方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特别是上午讲到的专业主义，我觉得现在确实应该强调一种专业的精神。大学应该有专业的氛围，而且要追求自己专业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重新回到我们大学主要学习层面方面的话，那么会对我们大学专业精神、专业主义的发挥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另外一点，今天上午也讲了大学的独立性，这一块也非常重要。因为大家讲话的整个过程中都谈到了依附性，就是讲现在大学社会化、行政化、官员化，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大学的发展，所以大学除了专业性以外，其独立精神是我非常的认可的。刚刚他们也谈到治理的问题，谈了很好的建议。今天在座的专家、学者都说得非常好。我想从这个方面再补充三点建议：

首先，我们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培养了一些比较窄的工科的人才，通才教育做得不够。怎么样让高等教育把我们的通才教育培养出来，特别是我们在人文、社科这些领域仍十分欠缺。我们除了专业主义精神是办大学要提倡的，培养人才方面怎样从通才教育方面入手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大家谈了这么多，提了很多建议，我也有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现在教育体制的环境僵化或者说没有创新，跟我们文革以后的经济所处的状态有些类似之处。那么想想我们经济是怎么搞活和转型过来的，对我们今天教育的改革也有借鉴意义。比如我们经济改革搞了对外开放、国际合作，特别是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对外合营这些方面，所以我们能不能在中外办学方面有大的突

破？这些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我们原来的中欧国际商学院，当时培养的学生教育部不承认，但是市场承认，市场给予他最高的待遇，国际评比最高的名次，学生最受欢迎，最后教育部承认了，而且它带动中国教育管理的发展。所以我们能够像当年开办合资企业的精神打破当时经济不可改革状态的话，我觉得采取国际办学、国际合作和对外开放来办教育，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口。因为我们靠内部的这种推动阻力非常大，有了这一块可以带来更大的推动。所以如果能够放开一些国际上的，不是低端的而是高端的，能做出一些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样本、不同的模式的话，它会带来对我们所有教育体系大的特点。因为它学校的模式完全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块如果能够大力提倡对外办学，这才是中国教育大的突破。

第三，人才应该流动起来。现在我们大学好多是“近亲繁殖”现象，我们的大学现在基本海外留学生和博士生回来找不到位置，一般没有大的问题人才不太流动，是个铁饭碗。所以这方面不打破的话，新的人进不来，机制运转不起来的话，中国的高等教育很难搞。还有一个是加大聘请国际引才的力度，这也可能是推动教育改革的新的方向，不光是我们办的北大清华留学生的试点。我觉得可以扩大，让国际知名学者办学、办院、办系。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杨东平

我讲两点：第一点，为什么我们支持这样的研究；第二点，谈点看法。

第一，为什么支持这样的研究。在中国这过去的十年里，2000-2009年是中国高教发展变化特别大特别快，我觉得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但是总结的时候为什么同时做两个，一个是做咱们体制内的，咱们自己来总结。但同时要多元化，要找一个不是做教育的人看一看。为什么找新加坡的团队呢？我一个观点是中国的教育做好必须不是做教育的人关注教育，教育才能更好。他们的视角兼具内外两边，而且说话的身份相对比国内方便一些。

另外，咱们今天一直讨论教育哲学的问题，好比一棵树长在那，咱们老说地面的问题，这个树长得好不好，是否需要剪枝、打杈等等，但是它根部的土壤与水分对它非常重要，如果教育哲学不把“根”弄清楚的话，依旧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像刚才扩招的争论我认为都有道理，但是这个关键是在哪呢？就是站在哪个领域上看这个问题。实际上的你没弄清楚这个事的时候就去这个事，这就是一个问题。咱们可以犯一次错误，不应该老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要做教育。另外，现在要正本清源，不要老在地面上，要看看教育的“根部”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再改就很难。

第二，方法跟路径。中国高教应该扩招，但扩招是何方法，其路径在哪、方法在哪、规则在哪，这些路径、方法、规则与最终目的要对，是为了这个国

家的长远，而不是为了近期。但不能光考虑哲学，你要去找方法，如果不把方法这些东西做对的话，即便再好的目标，你就是到了那作用仍然有限，甚至短期是正作用，长期就是负作用。

我想再次重复我的观点：要把哲学做对，同时要把方法、规则做对。

上海建桥学院校长 黄清云

中国人提出一个有关中国粮食生产的问题，说中国粮食生产大量靠化肥而不是土壤本身。一公斤化肥生产八公斤粮食，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把土壤破坏掉，以后再去弥补就来不及了。中国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理论准备，领导者做事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所以往往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搞高教；08年以后就搞房地产；九十年代后期搞医疗改革，但是改革之前都没有去思考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就这个“时髦”就去做了。所以，教育这方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下去，虽然会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执行院长 胡娟

我今天听了这个会议特别受教育，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感想跟大家汇报一下，主要汇报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我对学术研讨和本身这个模式的感悟，因为我曾经在英国、美国待过，很习惯那种模式。但是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以后，我发现我们很多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问题不给学者半个小时以上他是讲不清楚的。但国内很多学术会议每个人都只有10分钟的发言时间，听的人没听明白，发言的人也没有讲清楚，所以这个模式本身印证专业主义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通过这种模式，我们说形式决定内容，通过这种模式、形式学到很多，对郑教授的研究成果我们有了比较好的认识。但是我们对他的研究了解得还不够，比如我们了解他的结论，却不了解过程是怎么得出来的。包括他们整个团队是做其他社会科学的，却怎么样能够一下非常迅速的入手，抓住我们高等教育研究者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展开研究，这都值得学习。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专业主义的形式我们确实需要反省。

第二个感悟，关于高等教育自身存在问题进行研究的感悟。他们从哲学入手，讲到高等教育的治理问题、知识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问题，他们用专业主义把它串联起来，那我们也就知道谈到教育哲学问题。我们说高等学校，其实是法律上赋予的具有法律认证的机构，那它的认证存在就像其他的公司一样。一家贸易公司存在的理由是可以促进商品之间的流通，一家学术机构存在的理

由是什么？因为高校追求高深理论，所以一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非常有价值，我个人也非常赞成通过对中国教育思想的梳理，这种类型的方式提出专业主义的结论。这些年我一直对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在思考，今天又重新启发了我，我觉得非常受教育。

关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我也非常赞成，其实专业主义也是要求我们整个学者自身抵制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学术权力庸俗化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专业主义的提出再一次向我们提出不要谈高深的目标，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最好。我们经常讲高校的行政管理里半行政化，但是我们如果跟欧美教师相比，我们的教授其实是最不受约束的一个人群，就是我们的教授可以随意的出去挣钱，教授像商人正是这样的道理。我们虽然有特别强的行政主义，但是有特别弱的管理。事实上，从学术机构的长远发展来讲，如果不自觉抵制这种庸俗主义，将来你可能连这个位置都没有了。特别是现在知识生产方式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有一天高等学校被废除也不是不可以。中世纪大学曾经是科学进步的阻碍，那么它通过自身的推陈出新才能够富有新的生命力，那么我们的大学确实需要反省，专业主义确实是一剂良药。

最后，我中午跟杨东平教授与其他几位教授聊天，说中国高等教育出的毛病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有的教授说它已经不是某个方面的疾病，而是全身性的疾病，有的教授认为得是肿瘤，也就是说非常严重。那么这种病怎么治？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得了非常严重的肿瘤，西医一直想找到特效药，但是中国是不是自己没有很大的办法？是有的，很大的一个办法是休养生息。高等教育上对休养生息概念的理解是不是尽可以少加一点评估，尽可能少加一点外在的东西，把真正属于自己的真正做好。八十年代做大学生的时代我们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一代人，老师的知识虽然相对匮乏，但我们非常幸福，学生和老师对于自己知识的热爱退到那个年代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全国人大常委 朱永新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从外部来说，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梳理清楚。

第一，我们的人事制度。中国的人事制度并未改革，还是这么重学历、重声望。现在考公务员，很多单位明确要求要博士、硕士，连本科都不要，这个实际上严格的来说，如果在美国的话他可以告你违法，人才歧视。现在中国的人才歧视可能是全世界比较严重的，按理是不允许有任何人才歧视的，从公务员带头把人才的概念理清楚。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家就要上名牌大学，所以最后就看名牌，资源不断的在往好的学校集中。中国大学不平等竞争就是由人才制度造成的，这是一个问题，人才制度不改，高等教育不会有希望。第二是劳动分配制度。现在收入差距太大，尤其是在中国长期贫富不均的社会里面，为什

么它会聚集在城市？为什么会聚集在好的单位？为什么不愿意到基层去？这都是由体制造成的。同样是公务员，在大城市和在边远地区相差太大，所以劳动分配制度也应该改革。

第三是高等教育立法的问题，现在很多问题如果不通过法制的问题理清是很难解决的，高等院校的单位领导负责制，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关系很难理顺，应该从法制的建设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立法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很多通过立法是可以解决的。

从内部来说，第一个是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做切割，行政化的问题并不是最可怕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切割开，做行政的不要做学术，做学术的不要做行政。现在高等院校连服务人员都要去评高级职称，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在高等院校有服务型人才，他可以走另外一条路线。然后有学术权力的人他会拼命的去用行政权力，有些人是行政权力瓜分学术权力，所以所有人都要去当官，一定要当系主任、当院长、当校长。应该有规定，只要做校长、院长就不能评职称做项目，服务完了以后回来。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以自我为中心彻底的切割。

第二个是中国的教学模式，高等学校人才质量为什么低？我们的教学模式有问题，教学模式还是中学的模式。对学生没有更多的要求，即使有要求也没有检查，课堂不是对话，课堂就是老师讲，所以学生记不记无所谓，学不学也无所谓。在研究生阶段这个问题更突出，大量时间找工作，大量的时间在挣钱，很少有精力做学问，所以如果没有一套好的教学模式的话，人才质量是不可能高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要做一个革命，教学内部的模式，这完全是高等教育自己可以做的。第三个是民间力量的介入。中国民间资本、民间力量没有走入我们的教育，如果民间资本进来以后投那么多钱是不甘心的，一定要把事情做成。如果没有民间资本进入，大学没有竞争。如果民间资本进来，允许上市公司参股我们的大学、改造我们的大学，这样大学就有竞争力量。所以民间资本、民间力量进入大学才能推动我们大学。

【黄清云】：刚才朱教授提的是行政跟学术分割。中国教育分类方法不仅行政方面没有分类，教师也老是按照级别。这个非常不科学，也制造很多矛盾，这是不利的，实际上中国可以和外面学很多科学的分类方法，我们把人分三六九等非常不平等，应该根据大家的功能、责任来做比较。

华中科技大学学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炬明

第一个问题，专业主义是不是一个问题？中国高校缺少专业主义是一个事实，我们要解决专业主义这个现象，但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能从原因入手的话，那么现象是解决不掉的。比如说靠工资改革或者是靠治理结构的从无限到有限，我觉得专业主义是一个社会结构进化的。如果你考察专业主义的发展，你会发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当代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细，然后专业主义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专业主义并不仅存在高等院校。专业主义并不是高等教育特有的，各自逐渐澄清自己的界线、边界的时候专业主义才能够出现。

我同意祁教授讲的概念，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光是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说应该看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系统，其必须在这个系统中变化而变化，我们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认识，然后在这个结构过程中提出我们高等教育的结构怎么在社会进化中进化好，这就是技术路线。

第三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正好是个好机会，前一段时间改革是经济增长，从2010年开始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说下面的发展一定是改进社会结构、提高社会公平、提高社会效率的改革，也就是说社会改革的这个概念已经进入了中国。我们后面要更多涉及好的合理的社会，促使中国向现代社会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你整个问题摆在这个框架来做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最近发表《中国“2030”》那就是大的结构的思考，然后包括中国中长期规划，科学发展观指导那一系列的规划，都是挺好的。所以因此我建议后面改的时候，我真不建议你用专业主义，我倒建议你从大结构讲，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怎么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结构。

【黄清云】：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教育结构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从

“亚洲四小龙”的角度看，我觉得教育系统对改善社会结构扮演非常大的角色，如果我们等中国出现好的社会结构再搞教育就来不及了。我自己也观察，中产阶级庞大的社会也是中等技术庞大的，技术跟人才、中产阶级刚好重合。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高端的技术，低端的很少，那么中间的技术这一块最多，中国中间这一块只能是我们做。所以中国如果要改变这个社会结构，可能高等教育改革就是一个突破口。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简介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www.ccg.org.cn）简称 CCG，是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所发起，由国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国际化智库研究机构。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公共政策等专家的参与，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建设性和可行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成为国家、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高端国际智库，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提供独立的和客观性的研究。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包括：建言献策、国际问题、国际人才、可持续发展、企业国际化、华侨华商、海外留学与海归创业与发展等领域，CCG 尤其在国际人才发展和海归创新创业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如 CCG 于 2008 年参与中组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2》的可行性研究工作，负责“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研究；CCG 于 2011 年 5 月完成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的“完善中国绿卡制度”的课题研究报告；CCG 于 2010 年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侨办委托的“海外华人华侨专业社团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课题，并荣获国侨办优秀课题论文二等奖；由 CCG 编辑出版的《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是国内首次专门研究和出版中国出国留学和回国发展的蓝皮书。

中心还通过研究、出版、刊物和讲座等一系列的方式，研究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相应的研究和政策对策，供政府、企业和公共机构等有关部门决策采纳和参考，成为中国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高层次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目前已成为中国有关部门政策咨询的一个国际智库，承接了多个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课题；并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部委保持密切联系和畅通的建言献策渠道，为这些部门提供咨询和参考；已向中国政府有关部委提交过多份建言献策报告，影响和推动政府的相关决策，其中部分报告已经成为国家推出的政策参考和依据。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也是海内外留学人员、中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前政要智慧和思想交流的平台，通过举办圆桌、午餐会、研讨会和中外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建立广泛的国际交流和思想影响力的网络。